



凤凰卫视
凤凰书品

[世纪大讲堂]

曾子墨 王鲁湘 / 主持
阿 忆 许戈辉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凤凰卫视
凤凰书品

[世纪大讲堂]

曾子墨 王鲁湘 / 主持
阿 忆 许戈辉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的文脉 / 凤凰书品编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6

ISBN 978-7-5502-1550-4

I. ①大… II. ①凤…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09424号

大国的文脉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喻 静

封面设计：孙丽莉

版式设计：左巧艳

责任校对：徐 玥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31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6印张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550-4

定价：3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目 录

大
國
的
文
脈

第一章

- 001 世界视野下的中华文化 / 余秋雨
- 015 解读中国当前文化思维中的几大误区 / 余秋雨
- 025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 汤一介
- 033 探索中国古代文明 / 李学勤
- 045 大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 朱大可
- 055 土地 族群 文化 / 席慕蓉
- 065 文化的金融学逻辑 / 陈志武
- 079 儒学在台湾 / 傅佩荣
- 089 如何破译养生背后的文化密码 / 张其成
- 099 揭秘中国古代性文化 / 刘达临

目 录

大
国
的
文
脉

第二章

- 109 文学的魅力：文学的方式 / 王蒙
- 119 文学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 曹文轩
- 129 语言的自觉——汉语写作的自信心 / 李锐
- 139 西方文论与传统词学 / 叶嘉莹
- 159 《红楼梦》的意蕴 / 叶朗
- 171 艺术的绽放 / 蒋勋
- 191 走近生活、走近艺术 / 韩美林
- 201 20世纪美的误区和古典主义精神复归 / 范曾
- 213 古典美学与现代意识——青春版《牡丹亭》 / 白先勇
- 221 当代戏剧之命运 / 魏明伦
- 229 遥听海上回声——从上海老歌看海派文化 / 陈钢
- 241 漫谈中国雕塑艺术 / 钱绍武

第一章

世界视野下的中华文化

余秋雨

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艺术理论家。1946年生于浙江余姚。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2010年，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著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

我们常常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确它会对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进入了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但是我们看到世界文化的格局依旧是多样化的，而且在这其中，中华文化是很重要的一员。那么在世界视野当中，中华文化有着怎样的特质，它又应该如何来传承和发展。

——题记

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化？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提到这两个字好像都知道是什么，但又觉得有点抽象。据我所知，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定义有两百多个，这两百多个定义都有它充分的理由。经过最近的学习研究以后，我自己得出一个概括性的选择，我认为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再经过时间的积累变成了一种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大家都需要文化，但是文化没有作好这方面的准备，经济在快速发展的时候，文化和经济失衡了，大家就都需要文化了。但是没想到经济转型了，文化没有转型，文化拿不出那么多的答案来回答经济，对于传统的文化也没有作好选择，所以产生了一大串的误会，我可能会讲得更深入一点儿，就是在这个误会解除以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如何？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世界中的中国人，它的整个文化心理是怎么样的？我们有哪一些需要保持，有哪一些需要扬弃。

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文化问题产生了，一方面就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失落很多，那是速度造成的，即使我们祖先给我们的东西很多，但在如此的加速度当中也会丢失很多。另外一方面，这种快速的发展带来了外面的不理

解，在过去闭关锁国的时候，我们说外面不理解就让他们不理解好了。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了我们的顾客，成了我们的直接消费者，我们怎么能够不管，就像我写作一样，我怎么可以不管我的读者，如果当他们对我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行为产生的各种问题产生不理解的时候，这个问题一定是个精神文化问题了。

比如现在关于中国产品质量问题产生了许多世界的舆论，这些舆论有的是对的，对我们的产品质量提出了很多质疑，但是其中确实也有很多夸张的、颠倒的、歪曲的部分，我们怎么理解它，因为这里边确实牵扯这么一个概念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另外一个人群故意地要用有毒的产品来卖给某一大群人，如果这个逻辑能够建立的话，这真是一个大人群给另外一个大人群的一个可爱的负面判断，这个负面判断就是有关文化了，这个问题我想用这么一个比喻来说明，就是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巨人，这个巨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过来了，这个巨人的身高、腰围我们都知道，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他的动作我们也看清楚了，但是我们对他确实有一点儿害怕。

如果说他走了很多很多的路指的是中国的历史的话，那么他的身高腰围就指的是中国的人口、中国的GDP^①、中国的经济总量，那么所不了解的一点就是巨人的性格和脾气，性格和脾气就是中国的文化，由于文化未被大家所理解，所以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突然一出现，至少让大家感到陌生，或者说不安全。于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自我确认和大家一起来确认就成了一件大事情了。

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文化传播得好或者自己选择得好、确认得好，许许多多的现代灾难都可以免除，大家都会对你产生非常好的印象，我们许许多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共鸣箱，产生正面的声音，反过来就会产生我们努力却得不到好反响的结果，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对自己也

① GDP，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会失去自信。我一再地在国内讲这样的例子，像德国曾经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应该说它的民族形象有点儿狰狞，但是由于它出过巴赫、贝多芬，出过歌德、席勒，出过康德、黑格尔这些文化名人，德国的文化形象建立以后，尽管他们有那么大的问题，人们对这个民族的态度还是一样的。那么正好我们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了，以前谈不上，但现在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了。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忙乱当中至少有两个误会。一个就是用大量的文化表象来填塞文化空缺。这我们都看到了，有各种各样的古典诗词，一大堆的宫廷权谋古诗，一大堆的古董字画，一大堆的咬文嚼字，到处都是文化，造成的结果是好像文化很多，但是最关键的问题，精神文化的重新选择和重新建立却被淡化了。

第二个有可能产生的误会就是我们用一大堆的人类共性来定义中国文化，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突然觉得我们的经济好了，我们的文化的一切就都是好的，所以大量的美丽词汇就出来了，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很多很多，譬如刚健勇敢、勤劳勇敢，譬如尊老爱幼，譬如实事求是，这些其实说到底是一切文明的国度都具备的，只是词汇不一样，我们是用中国话讲而已。哪怕是孔子所说的最有名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少我看到在孔子之前好多年的拜火教的教义里面就讲，绝不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别人，这才是最大的慈善。你看人家也讲了，只不过我们用这样的语言来讲，人家用其他语言来讲，所以我们不能把谁都有的东西说成中华文化，最近这是一个倾向。

中国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承认，在所有人类的古文化当中，现在唯一活着没有中断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好，这点如果成立的话，我们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它长寿的秘诀在哪里？长寿的秘诀是我们的通俗语言，如果用学术话来说，就是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在哪里？好，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引子的话，我下面就要讲第二个问题了，就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相比，它有几个可对比性的时段，在这个时段当中说明中国文化的特殊生命力，它的生命力强和它的特殊生命力弱都在那儿体现了。第一个时段用两个字说明，叫门槛。中华文

明是什么时候跨入文明的门槛的？夏、商、周的夏代是我们进入文明的门槛。这个门槛的标志有很多了，比如需要有文字，需要有青铜器，需要有祭祀仪式的痕迹，这些都表示进入文明了。我们不要老讲中国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因为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文明已经成熟，比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巴比伦就是我们说的两河文明了，实际更早还有一个在巴基斯坦的古印度河谷文明，然后波斯文明、希伯来文明，这些文明不仅成熟，有的已经开始走向衰败了，所以和它们相比，中华文明是发源比较晚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

好，马上进入第二个时段，这很容易，第二个时段就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我给它定义两个字叫水边。为什么叫水边呢？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各个文明在没有文化交流的情况下，所有第一流的伟大人物同时降生了。比如释迦牟尼^①比孔子大十四岁，孔子死后十年苏格拉底^②诞生，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十二岁，比庄子大十五岁，他们同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之前就讲，公元前5世纪真是奇怪的时期，当时希腊的哲学家在海边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家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和人的关系，这个讲法比较粗糙，后来我再仔细研究就觉得希腊哲学家主要在思考着精神自由，印度哲学家主要在思考着灵魂解脱，中国哲学家主要在思考着社会管理。

第三个对比点我用两个字来概括它，叫帝国。大家知道吗？世界上有很多聪明人，大家都在思考，但是好多聪明的思想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可有几个地方在思考的基础上以帝国的规模把思维用行政的结构固定下来了，有一种大的帝国气象使这样的思维，使这样的精神变成为一种实体。在公元前后

① 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名悉达多，佛教创始人。

②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青年时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随后创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世界上出现了三个大帝国，最早是印度的孔雀王朝^①，其次是中国的秦汉帝国，然后是欧洲的罗马帝国^②。正因为有帝国使原来充盈的所有的智慧的思想体制化了，譬如我们的统一思维，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那时候实现了郡县制、户籍制，这些思维在帝国化的格局下才能做到，才能慢慢地把诸子百家当中聪明的思维变成一种国家哲学。

但帝国都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蛮族的入侵，所有的帝国都遇到这个问题。最后它的消亡大体都是如此。大家知道，我们觉得那么辉煌的罗马帝国是在公元 476 年灭亡的，从此以后，罗马越来越荒芜，后面经历的大家都知道，是漫长的中世纪。

中国也遇到了蛮族入侵，但这个蛮族太可爱了。首先是匈奴，我们知道，汉朝对匈奴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进退的武力，汉武帝一辈子都在动这个脑筋，中国当时的主旋律就是怎么对付匈奴。但是汉王朝和匈奴打斗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了不起的刚刚从原始社会走出来的民族，叫鲜卑族，我们也简单地把它说成蛮族吧，它统治着中国整个北方。鲜卑族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在哪里呢？他们刚从原始社会出来，掌握了那么大的权力，统治了中国北方的整个地域。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现在统治的地方都是农耕文明，过去是游牧文明。他们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弃农从牧，回到原始社会；第二个选择是改变自身，投向农耕社会，因为大多数统治地区是农耕文明。鲜卑族的首领选择了后者，提出了汉化。这个汉化非常彻底，不准讲鲜卑话，不准穿鲜卑的衣服，而且必须和汉族通婚，而且把他们的首都从现在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诸子百家的思维就能走向大唐，缺一种气象成不了盛唐，这个气象就来自所谓北方蛮族，就来自原野之气。鲁迅讲过一句话叫，唐人大有胡气，就指的是大有北方的气象融进来了。我们看到，鲜

^① 孔雀王朝，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约前321（一说前324）年建立，都城建于摩揭陀国的华氏城，传至阿育王（前3世纪中叶）达到鼎盛时期。约前187年为巽加王朝所取代。

^② 罗马帝国，通常指前27年至公元476年这一历史阶段的古罗马国家。

卑族和汉族通婚造成一个个有趣的景象，唐高祖李渊^①的妈妈是鲜卑族，唐太宗的妈妈是鲜卑族，唐太宗的皇后也是鲜卑族，所以等到唐高宗的时候，他的血缘四分之三是鲜卑族、四分之一是汉族。大唐王室的血缘就是这样，所以大汉族主义是完全站不住的。我们最骄傲的大唐就是以这样的种族组合的。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可爱的对比，当时的欧洲情况就相当不好，肮脏、阴暗、狭小。比如西班牙的托莱多那个城市，那里的宗教裁判所处死了四十万人，当时的黑暗和大唐的辉煌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我前一阵到卢克索的时候，埃及的讲解员在讲解，说他们当年的这个城市有可能是世界古代最辉煌的城市。下面轻轻地讲一句，当然除了长安。他必须讲当然除了长安，因为长安当时实在是太辉煌了，这是我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点。第四个对比点就是我所说的奇迹。

好，最后进入的时间点叫远方。我用两个字来讲远方，也就是说如果跳过元代、宋代以后，明代到清代这一共五百多年的时间处于什么状态呢？我们的管理哲学还在起作用，这个国家管理得还不错。但是远方的欧洲从黑暗的中世纪终于走出来了，在14世纪发生了文艺复兴，然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而中国大体上还维持在一种集权的、稳固的、保守的结构当中，所以在五百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只能用“远方”两个字来概括，我们对远方所发生的一切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远方所完成的科学、社会体制和艺术方面大力地推动对人的重新歌颂对社会起了多大的作用。这时候我们明显落后，而且落后得相当严重，我们也有辉煌，但是那是两种辉煌。乾隆皇帝是死在18世纪最后一年，他生平最满意的一件事情是编成了《四库全书》^②，我们不讲政治，讲文化了，他编《四库全书》是花了九年时间叫纪晓岚先生和其他的

^①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史称唐高祖。617年（大业13年）率军起兵，618年（大业14年）正式称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

^②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皇帝组织编纂的一部大规模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在此过程中，还编写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等。

人一起编的。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寻找在这九年当中，中国做了那么辉煌的文化传承工作，西方发生了什么。这一查就非常惊讶了，对比发现，就在我们编《四库全书》的这九年，瓦特的联动式蒸汽机发明了，德国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座铁桥，法国修成了世界第一条铁路，而且还完成了热气球的自由飞行，水分子被分解等。这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里边，他们有休谟的《人性论》^①，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②，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③，而且歌德、伏尔泰都在这个时期活动。我们由于过去太辉煌，历史太悠久，我们只是在整理，而他们在探索。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田野考察。我们在回顾既往，他们在遥想未来。在19世纪的时候就受到了惩罚，我们发现远方要比我们这儿快得多，我们这儿明显慢了。

按照这么个脉络，我来概括一下我的想法，在这一段历史中，中国和世界的一次次频繁的对比，有的时候我们很辉煌，有的时候我们很落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终于熬到了今天，而且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文化。有几点是我们长寿的秘诀：第一点我觉得是不喜欢远征，古巴比伦、古代的以色列、古代的波斯，打仗打得没完没了，特别是在两河流域，这个消灭那个，互相跨埠远征没完没了。相比较，中国从农耕文明出发的思维对远方的土地兴趣不大，可以去玩，可以去赚钱，但是没有占领的欲望。哪怕是郑和下西洋去了那么多地方，上至郑和，下到他的任何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人产生过对他登陆的土地的一丝一毫的占领欲望，没有产生欲望就表示文化本能使他没有这个可能，这已经不属于政治，只属于文化了。

那么，这种不喜欢远征的思维对中华文化的长寿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因

^① 《人性论》，英国哲学家休谟的著作，写于1732—1736年，全书共三卷，分别是“论知性”“论情感”和“论道德”。

^② 《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本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部重要典籍。

^③ 《社会契约论》，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一本著作。全书共四卷，论述了社会公约、主权和政治等问题。

因为在世界古代史上有一个规律，就是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远征哪怕胜利，对文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摧残，因为它最精英的文化继承者都成了士兵，然后他们所带的文化到了战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水土不服，最后都是沦落成影，几乎都是如此。我看了浩如烟海的中国帝王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文件当中，都没有称霸世界的点滴之举，而在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在好多国家的文件当中却都有，而中国没有，这证明一点就是不喜欢远征确实是中国人的思维，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个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判断也都大体一样。

第二就是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中国人出现了第二个不喜欢，不喜欢极端。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和我前面讲的孔子所提出来的中庸之道紧紧连在一起了。无论是早期的极端主义还是晚期的极端主义，中国人有的时候会介入一段时间，比如我们知道，像义和团、“文革”，但时间不会太长。主轴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把它看成庸人哲学。其实不是，我看到好多海外的哲学家在论述这点的时候都说，中庸之道就相信这两个极端之间，一定有一个两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合适点或者恰当点，中庸之道就寻找这个合适点和恰当点，所以孔子说中庸之道是至德，是最道德，因为他把两个极端的人都关照了，两个极端的人很可能反目成仇好久了，但有了中庸之道以后，就有可能把他们拉到一起了，即使拉不到一起，也不增加两边任何一方面的势力使他们冲突加剧，这也是中华文明延续长久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是不喜欢失控，总需要秩序。帝国时代之前，我们的先秦诸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孔夫子周游十几国，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墨子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不要变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土地。后来我看到汉德堡大学的马克思·韦伯曾经讲过，他没来过中国，但他说到长江、黄河，就光凭治这两条河就不允许中国分裂，这个国家治了这一段，到那一段换了国家，那怎么行呢？总之要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思维使中国比较早地保持在一种可控状态之中。这是我认为中国不灭亡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再讲一遍，就是三个不喜欢：不喜欢远征，不喜欢极端，不喜欢失控。

但是由于长命也带来另外三个和它相应的文化缺漏，我讲一讲这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我自己是有感觉的。第一个是不在乎公德。中国传统思维喜欢为两个“ting”负责，一个是朝廷，一个是家庭。对朝廷是忠，对家庭是孝，对于朝廷和家庭之间辽阔的公共空间没有予以注意，没有予以论述，对这个很陌生，不知所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旅行者到国外有的时候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大家都说道德不好，我多次讲，可能有的是道德问题，有的还不是道德问题，主要是对公共空间的无知。我有一次跟台湾的朋友讲，很可能那个你们不喜欢的随地吐痰的黑面妇人，她可能收养好几个孤儿，但是她对公共空间却完全无知，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存在。对公共空间不了解，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由于你没有注意公共空间，也就不在乎公德了，不会想着我需要对社会上和我毫无血缘关系的人负责，需要关爱他的生命。这在中国的传统文本当中讲得比较少，有的时候有可能推演一下，比如要像爱自己的老人一样去爱别的老人，要像爱自己小孩一样爱别的小孩。这是推演出去的，它的价值重心还在家里，从家里推演出去的。对公共空间注意比较少，这是第一个中国文化的缺漏。

第二个中国文化的缺漏是不在乎真假。这个问题现在想起来是比较严重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的文章对我刺激很大，他说他看朱元璋《明实录》^①，那是国家的档案，他说翻翻那里边的数字记录就会发现很多重要数字都是天大的错误，数字都是乱的，但是无论校对者、抄录者、阅读者、审查者，没有一个发现的。对这个不敏感。几百年，几千年人们历来关心的是忠和奸、善和恶，真和假却不太管，所以历史上就永远出现很多真假难辨的问题，永远在真和假的问题上出问题。老作家巴金，他活了一百多岁，写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文章，他的遗言就三个字：说真话。我又看到诗人北岛，他到台湾去访问我们都很尊敬的星云大师，说星云大师，

^① 《明实录》，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书中记录了自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15代皇帝的史实，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

您去大陆很多很多次，您觉得大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星云大师对大陆其实很有感情，他笑眯眯地说了一个字，假。有很多假的东西，一百多岁的巴金先生和星云大师这两位老人都看出了，那这个问题就真值得我们注意了。我们现在的经济领域倒是慢慢地开始走向了所谓数字化管理。但黄仁宇先生说，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缺少这一点，所以特别喜欢听谣言，也特别喜欢传播谣言。如果遇到谣言，抗辩机制是不存在的，我们每个人也没有任何抗辩的办法，这是民族传统。所以很多中国人总是带着永远说不清楚的无数谣言和带着自己听来的无数谣言走向坟墓，往往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要走向现代化的路程就麻烦很多。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产品质量的问题和其他问题都和这个问题有关。我们假、大、空的问题也和这个问题有关，虚假排查的问题也和这个东西有关，排查口那么大，大家都在讲空话、假话，都和这个有关，对假缺少敏感。

第三个文化的缺漏是不在乎创新。这我想其实大家都明白，因为我们的传统比较丰厚，所以我们总知道回顾，我们总知道整理，我们总知道仰望前辈，而不太知道去创新。我们不断地提出创新口号，但是在文化心理上更麻烦，麻烦在哪儿呢？我们还会来指责一切突破原来规范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各种各样的做法和各种各样的设计，我们认认真真地学国际规范，但真正的创造很少。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陷阱，我多次讲过，叫作无争议陷阱，它影响了创造。什么叫无争议，无论在政治上，无论在科技上，无论在学术上，无论在文化上，一个东西要规范首先有个前提叫没争议，大家知道吗？没争议一定是没有创造，没争议一定是没有突破，没争议一定和创新无关，这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永远落在一个无争议的陷阱里边，创新一词是提不起来的，这样的话，我们永久地在模拟别人，我们永久地在歌颂前辈，而不知道为前辈创造一些新的东西，为他们增光，比如现在我们复制别人的产品而少有创新都和这个有关。

我想说明一点，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什么？是漫长的历史当中我们的祖先由于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对我们的后代进行的一种设计，我们要看清

楚祖先对我们的设计，然后我们现在在新的水平上重新进行整个民族性格的设计，我讲到民族性格其实只指出一点，所有的文化最后都落实在集体的人格上，我们不喜欢侵略也好，我们不喜欢极端也好，是不是落实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性格当中了？对，那么我们不太在乎公共空间，不太在乎真假，也是落实在我们的集体性格上面了，所以我们要研究文化问题实际上是研究自己，研究我们这个群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开辟出新路，首先要把我们领导起来。

提问一：关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只是谈文化好像给人一种比较单薄的感觉。我认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个民族的文化层面、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发展好像一个螺旋桨的三片叶子，必须要经常矫正它的重量和角度，这个船才能向前行走。现在大多时候是因为过于偏重于政治的改革或者过于偏重经济的改革，一片叶子走得太快了，另外两片叶子跟不上，所以这个船没有向前行走，不断地打转。是不是能够让文化方面的改革唤起国民最新的信仰，有了这个信仰才付诸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方面的相对改革？

余秋雨：其实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我觉得特别需要提醒的一点就是，文化看上去是非常软的，抓不住摸不着的，但是它直接地关系我们的精神层面。前面我说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首先是精神价值，如果精神价值不能够趋利的话，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可能不知道方向，这是我前面讲到的纽约的一个经济研讨会里讲的内容，而且我们的政治步伐、政治改革也会缺少动力，这完全是一个基础。遗憾的是我们许许多多文化人过多地局限在自己本专业里边的一些琐碎的课题上了，琐碎是应该允许的，问题是琐碎，我琐碎，具备整体思维的人一直没有，结果就变成了一个我前面讲的文化烂泥塘。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呼吁不要把这样的事情全部托付给文化界，特别是我们企业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起很大的作用。我一直讲文艺复兴从哪里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些画家哪有那么多钱造一座需要使用很多年的教堂，哪有那么多钱造成一座座城市雕塑，连画也要画很久，不仅需要